

闲斋忆旧



钱谷融*著 罗银胜*编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

闲斋忆旧



钱谷融*著 罗银胜*编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闲斋忆旧/钱谷融著;罗银胜编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208 - 07910 - 6

I. 闲... II. ①钱...②罗... III. 钱谷融—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7164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特约编辑 贾建明

封面设计 杨德鸿

闲斋忆旧

钱谷融 著

罗银胜 编选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2 插页 4 字数 180,000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250

ISBN 978 - 7 - 208 - 07910 - 6/K · 1453

定价 25.00 元

序

罗银胜兄是我新结识的朋友,平日虽交往不多,但他的诚朴,他的乐于助人的精神,却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忽然对我说,他已为我编选了一本散文集,正在找合适的出版社。不久,他就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杨柏伟先生一起来看我,说已决定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散文集,并把书名定为《闲斋忆旧》。

这个集子里所收的最早一批文章,即《嘉陵江畔》,写于1939和1940两年,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正是生机蓬勃的时候,却已像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谈到“沉钟”社的许多青年作者们的作品时所说的“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断肠之曲”,散发出许多只有老年人才有的颓唐气息。但那里面所表达的感情却是十分真切的,今天读来,仍令我感慨无已。

正在这个时候,我忽然得到了一帧我经常思念的老师伍叔傥先生的遗照,我与伍先生自1949年分别以后,就音问不通,前年才从徐訏先生的一篇悼念文章中知道了一些他别后的情况。这次承温州友人沈迦先生特意送我这张照片,使我在与伍先生睽违60年之后,又一次看到了他的亲切的容颜,使我万分激动。《闲斋忆旧》的出版,我当然是很高兴的,但尤其高兴的是我能在这本书上郑重地刊出我最敬爱的老师伍叔傥先生的遗照。

最后,我谨在这里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罗银胜、杨柏伟二位年轻的朋友致谢,没有他们的热情的帮助,我这本小书是难有问世的机会的。

钱谷融

2008年5月16日



钱谷融先生伉俪



王元化、徐中玉、钱谷融先生合影



目录

001 序(钱谷融)

001 自述

003 且说说我自己

014 我的自白

016 最可靠的良伴

018 给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020 我爱读哪些作品

025 “难得闲静斋”盼闲静

027 我的中学时代

035 我的大学时代

046 上海,我还是喜欢的

048 海南岛五公祠的对联

050 难忘的澳门之行

052 美丽女神

054 我与师大

056 碧萝湖公园

058 谈谈我对研究生的培养

061 我希望……(外三篇)

066 关于《《雷雨》人物谈》

068 《《雷雨》人物谈》后记

071 《论“文学是人学”》后记

073 我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

——当时的想法

081 关于《论“文学是人学”》

——三点说明

089 《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

094 《文学的魅力》后记

097 《艺术·人·真诚》后记

103 《钱谷融对话录》序

105 嘉陵江畔

106 雾

107 雕楼上的少女

109 鸭

112 春雨

- 113 _____ 桥头
 114 _____ 子规
 116 _____ 平安
 117 _____ 再会吧
 118 _____ 足音
 119 _____ 死
 120 _____ 四月
 122 _____ 树荫
 124 _____ 路灯
 127 _____ 蜻蜓
 128 _____ 纳凉
 130 _____ 钟声
 132 _____ 灯下
 134 _____ 桥
 136 _____ 寂寞
 137 _____ 绿色的陷阱
 139 _____ 我的母亲
 141 _____ 我的老师伍叔悦先生
 144 _____ 哭王瑶先生
 146 _____ 悼唐弢先生
 149 _____ 忆陈瘦竹先生
 151 _____ 曹禺先生追思
 153 _____ 施蛰存先生
 157 _____ 一个真率爱美的人
 160 _____ 悼施蛰存先生
 161 _____ 困惑与遗憾
 _____ 在纪念郭沫若 100 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63 _____ 关于戴厚英
 166 _____ 《孙犁选集》：凝于笔端的永恒之美
 168 _____ 关于戴乃迭
 169 _____ 诗意与世长存
 _____ 怀念辛笛先生
 _____ 怀念陈伯吹先生
 171 _____ 追怀俞云阶先生
 173 _____ 谈王元化
 175 _____ 尤今和她的作品
 181 _____ 编后记(罗银胜)
 186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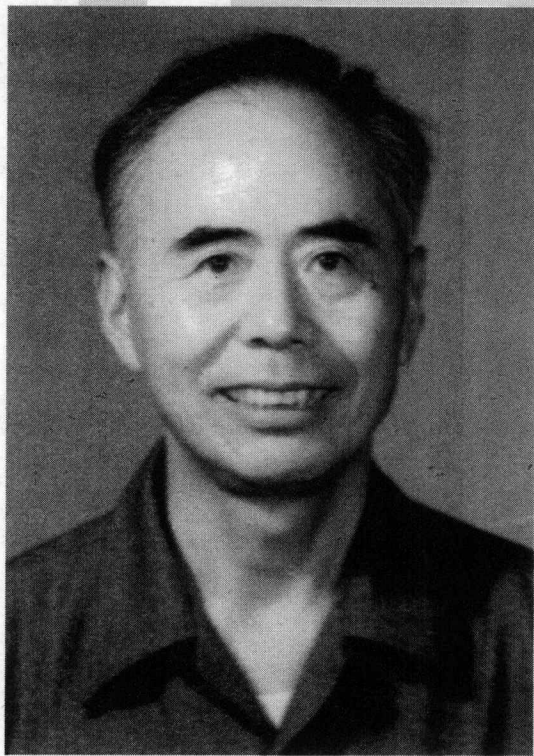


自述

我一生没有离开过学校，不是做学生，就是当教师。我平生最服膺的格言有二：一是希腊阿波罗神庙中的“知道你自己”。二是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知道自己是个最平庸、最无能的人，因此，我不敢自以为是，决不在人前逞能。诸葛亮的“淡泊”，是为了“明志”，“宁静”是为了“致远”。我既无大志，也不想高飞远颺，我之所以自甘淡泊，企慕宁静，无非是为了求得个自由自在，庶可少惹些无谓的烦恼耳。

我既无能又懒惰，一生碌碌，毫无建树。人们之所以知道我，一是由于在50年代我写了一篇题名《论“文学是文学”》的论文，受到全国范围的长时期的批判。其实这篇文章所谈大都是一些常识性的意见，并无多少独到的创获，它之所以受批判，只是因为不合时宜而已。而我竟茫然无知，足见我之幼稚。二是由于我历年所培养的研究生，有不少成了国内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但这主要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何况，指导研究生，属于来料加工的性质，来料好，产品自然也就容易见好了。

我自然也不能说是一无是处。我平日与友朋相处，总力求保持一种亲切而随和的态度。在自己学生面前，我同样也是如此。在对待学生的学术观点和思想见解方面，我是很宽容的，并不要求他们一定要接受我的观点。但在做人和治学的态度上，我的要求又是很严



钱谷融先生
在上世纪50年代。

格的。我认为做人必须正直、诚恳；治学必须严谨、踏实。如果学生在这两方面的行为，有悖于这两个原则，我是决不宽宥的。我的批评常常是直率而毫不留情的。我自知并无多大学问，只是老老实实地知道多少就说多少，决不敢弄玄虚，以炫示自己的高深莫测；而且总力求说自己有真切的感觉和体会的话，不喜人云亦云，随声附和，时时处处总不忘一个“诚”字。这种态度，多少也影响了我的学生，除个别也偶有不够严谨的缺点以外，他们绝大多数都能立足现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教书近六十年，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勉强够得上说是“桃李满天下”。现已年逾八十，也差堪自慰了。

生读诸君

外平说诸君

且说说我自己

我一向不愿意谈自己。这倒不是因为别的，只是觉得自己实在一无可谈。人既平庸，经历又极简单，如果也一本正经地向人们大谈起自己来，岂不是太可笑了吗？尽管自己所写的文章，曾受到过大规模的批判，但这样的事，过去在我们这里多的是，有什么值得谈的？不过，却就正因为这一点，竟使我顶了一个作家的头衔，居然被列入四川文艺出版社所出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一书之中。六年前，我曾应该书编者的要求，把自己的主要经历，像流水账似地简单写了一下。现在，编者来信说此书即将重版，希望我能把自己的传略作些补充修订，如能重写那就更好。我把过去写的东西重新看了一下，觉得确乎写得太枯燥乏味了。虽然自己平凡的一生，原本就难于引起人们什么兴趣。但既然要写，就得多少能让人了解到一些你的真实的思想感情，真实的性格。如果只是一些简单经历的交代，使人读起来味同嚼蜡，甚或像咬到涩果子那样难受，那就太对不起编者和读者了。所以这次我几乎全部重新写过，目的无非是希望能使读它的人少皱几次眉头而已；究竟是否能如我之所愿，那就知道了。

我原来的名字叫钱国荣，现在用的是笔名。1919年9月生于江苏武进。父亲早年教过私塾，因此当我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要上学读书的时候，尽管当时镇上早已办起了小学，他却仍把我哥哥送进了邻村他朋友办的一个私塾里去。我当时还小，本不到上学年龄，因为朝夕跟哥哥在一起玩，便也吵着要跟他一起上学，父亲也就答应了。第一天去拜老师的时候，在红毡毯上向老师磕了头，老师很和蔼，还给点心我们吃，觉得很有趣。可是后来，就渐渐地感到太拘束，不如家里自由，就常常想赖学。可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很严格，决不容许。先是哄骗，哄骗不成就继之以打，最后还是被强送到老师那里去。记得老师教我和哥哥读的是同一本书——《千字文》。小孩子当然不会懂，老师也并不讲解，每天教一、两句，只教我们跟着他念几遍，然后就让我们自己念。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我们背诵。每次我

都能流利地背出来。我哥哥却常常要打格顿，甚至要老师提示。于是老师夸我聪明，我自己和家里人也都以为我比哥哥聪明。在私塾大概读了有一年多吧，镇上那个被当地人叫做洋学堂的小学，逐渐得到了人们的信任，我老师的私塾办不下去了，我父亲才把我和哥哥送到镇上的小学去。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一年多的私塾，可以不必从头读起。当小学里的老师拿我们读过的《千字文》来考我们的时候，我尽管能够“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地背诵如流，但当老师用手遮住上下文，单独指着一个一个字要我认时，我就几乎一个也不认得了。我哥哥过去虽然常常不能背诵，却每一个字都真正认识。所以考试结果，我哥哥进了二年级，我却只能从一年级读起。记得那时是1927年的下半年，我已经八岁了。

在小学里读了六年，我一向是班上成绩比较好的一个，老师都很喜欢我。特别是五年级时候的一位老师，我还记得他叫王自治，字眺越，是绍兴一带的人，据说是大夏大学毕业的。他对我特别好，教了我一年就离开了。临走时，还特地把他的一部《天雨花》送给了我，并郑重地把我托付给一位同他比较要好的徐老师，要他以后多照看我。升到六年级时，教语文的级任导师谢老师，是新来的，刚从江苏省有名的省立无锡师范学校毕业。一次上作文课，我的卷子他批阅后发下来时，写了这样的批语：“从别处抄来，何得掩人耳目？”我很惊诧，去向他说明这是我自己写的，不是抄来的。他非常主观，仍一口咬定我是抄来的。我要他指出是从哪里抄来的？他非常自信地说是从《模范日记》上抄来的。当时这本《模范日记》很流行，我就找了一本拿去要他指给我看是抄的哪一篇？他当然找不到，但还是支支吾吾地不肯爽快承认是他冤枉了我。我小孩子家，受不得这冤屈，就在他的批语后面反批道：“批评之权在老师掌握之中，学生何敢乱道，然而……”这还不算，又在要交给老师看的日记中，把这件事写了出来，不指名地说，有一个老师硬把学生自己写的文章说成是抄来的，像这样的老师实在是太没有资格了，而且还标上《胡批》的题目。老师看了，并没有就我所记的内容表示什么意见，只在文后批了“字写大一些”这样几个字。老师是近视眼，但他之所以这样写，也许是为了可以让人理解为他根本没有看过这篇日记吧。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了。不想我的一个正在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部读书的表兄，忽然来我家玩，看到了老师的这句批语，并听我说了事情的经过，便怂恿我说：“他要你字写大一些，其实你的字已够大了，谁叫他自己是近视眼呢？你可以反问他：‘你看不见吗？’”我当时实在不懂事，又抱着一肚子的委屈和愤懑，就真的照他的话在老师批语后面反批上“你看

不见吗”这样一句十分无礼的话。这下子这位谢老师就忍无可忍了。第二天上课时，他怒气冲冲地把我叫到他的讲台旁用戒尺当众打了我十来个手心。他别的不提，只抓住我的“你看不见吗？”这几个字，说：“我今天就打你的‘看不见’。”我当时年幼，太不懂道理，实在做得太过分了。不知道我的谢老师如今是否还在，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了，而且我当时已经为此挨过打，我仍旧要在这里诚恳地请求他的宽恕。后来，王自治老师临走时拜托他对我多加照看的徐老师知道了我被打的事，特地找我谈了一次话，一面安慰我，一面也责备了我。他说，谢老师最初对你不了解，冤枉了你，后来也有些失悔。但你太不懂事了，怎么可以一再冒犯老师呢？不过，他又说，谢老师还是喜欢你的，你以后要好好听谢老师的话。后来谢老师果然对我很好，我是班上他最喜欢的两个学生之一，跟我很接近。

我爱读小说的习惯，早在小学里就养成了。父亲虽然是个私塾先生，但家里并没有多少藏书。四书五经之类我没有什么兴趣，也读不懂，最能吸引我的自然是小说。不知怎的，我第一部拿到手的竟会是半文不白的《三国演义》。而且我家里的一部还是大本子的木板书，一共有20本。我1937年就离家去了四川，中经战乱，此书自然早已不在了。我毫无版本知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刻本。当时我大约正读小学四年级或五年级，看《三国演义》，自然多半只是似懂非懂。但故事情节是看得懂的，而且很有兴趣。譬如曹操的奸诈，刘备的宽仁，张飞的鲁莽，关公的义气等等，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们的事迹使我深深地受到吸引，并开始知道了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初步建立起一种朴素的正义观点。书中最打动我、最使我敬慕的则是诸葛亮。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出山，三顾茅庐那一大段，把诸葛亮不求闻达的高远襟怀，野云孤鹤般的雅人深致，写得形神俱足，气貌毕肖，充满了动人的魅力。在读《三国演义》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诸葛亮是何等样人，读过《三国演义》以后，除了他的料事如神的超人智慧以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所建立的显赫的功业，而是他出山以前的那副散淡的襟怀和那种飘逸的风神。不知为什么，我当时还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我所最敬慕、钦羡的诸葛亮，竟并不是后来成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而是高卧隆中时的草野隐士的诸葛亮。我在和小朋友一起玩耍时，也常常带着自豪的感情说自己是“山野散人”。这恐怕只能归因于《三国演义》中的这一段写得实在太迷人的缘故吧！后来知道了诸葛亮有“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名言，我心目中最初形成的诸葛亮的形象，就益发鲜明高大起来了。这就种下了我此后遗落世事、淡于名利的癖性。当然，事实上一个人是无法遗落

世事,也不可能完全淡于名利的,但总算能够比较的超脱一些。因此,在我过去漫长的坎坷岁月中,尽管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我也能淡然处之,省却了不少烦恼。《三国演义》还使我能初步读懂一些浅近的文言文,并在写文章时能用“之乎者也”来代替“的了吗呢”。这一点不久就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小学毕业要上初中了,为了便于照顾,家里自然就让我进了我哥哥已经在读的那所中学。这所学校原来是一所国文专修馆,里面的教师大多是前清秀才之类的旧派人物,他们都不喜欢白话。我哥哥在我考取了该校将要入学就读之前,就用一种半是吓唬我半是自豪的口吻对我说:中学不比小学,作文哪里能用白话,都要写文言了。我听了不免有些紧张。上学后第一次作文,就硬着头皮“之乎者也”地瞎凑了一通,居然顺利通过了,还受到了老师的赞许。这不能不归功于《三国演义》对我的帮助。

读过《三国演义》以后,我对小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就把家里所有的小说书,一部一部地找出来读。那时也不能分别好坏,自然更不懂得选择,只能碰到什么就读什么。像《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说岳全传》、《封神演义》、《野叟曝言》、《金台平妖传》等等,就都是在小学里读的。那些年读过的真正的名著除了《三国演义》以外,就只有一部《水浒传》了。我生长在农村,村里的大人们农闲时常常央我给他们讲故事。我就把从书上看来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我也从中得到了不少乐趣。在初中时代,小说就读得更多了。但主要仍是读中国的旧小说。除章回小说以外,也看了不少笔记小说。如《子不语》、《萤窗异草》、《阅微草堂笔记》、《两般秋雨庵》之类。同时也开始对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散文名篇发生了较浓厚的兴趣。较多地读外国的翻译小说是进了高中以后的事。那些书使我大开眼界,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我结识了许多与旧小说中所写的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的思想爱好,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风尚习俗,与我一向所熟悉和知道的完全不同。施托姆的《茵梦湖》、洛蒂的《冰岛渔夫》、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书,给了我无限的欢喜和忧伤。特别是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等等,引起了我对人生的思考,在我心头激发起对青春、对未来岁月的朦胧的憧憬和充满诗意的幻想。这时,我已开始深深地迷上了文学,迷上了这绚丽多彩、充满魅力的文学了!我此后终于走上文学的道路,可以说就是因为中、小学时代对小说的爱好。

因为家境贫寒,高中我读的是师范。师范学校不但不要交学费,还供膳宿。我考上的又是一所名牌学校——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是很有学问的,在中学教育界很有名望。

因此亲友都为我庆幸,我自己也勤奋地学习着。1937年秋,我刚开始读三年级,9月间开学不久,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学校里也落下了炸弹,虽幸未伤人,但房屋毁坏了不少。警报解除后,师生纷纷逃离学校,战火也日益逼近,学校就此解散。我回到家乡,在母校南夏墅小学当了一段时期的代课教师。后来,昆山、青阳港等地相继失守,常州也岌岌可危。就在南夏墅小学一位年长的老师曹梦梁先生(后来听说他是地下党员,在五台山一带的游击战中牺牲了)的带领下,我们一共11个人结伴奔向后方,辗转到了武汉。当时武汉聚集了不少各地涌来的流亡学生,国民党教育部怕这些学生跑到解放区去,就在四川、贵州等地办了几所国立中学,收容原来在各省省立中学读书的学生。我因为是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的学生,就被送到设在重庆北碚的国立四川中学师范部继续读书。从1938年初读到那年8月,算是读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取得了毕业资格。接着就参加了抗战期间首次实行的全国各大学的统一招生考试。我报考的是当时正内迁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师范学院国文系,侥幸被录取了。中央大学共有七个学院,四十多个系科。师范学院是那一年第一次创立的。读师范学院不但不要交学费,膳、宿费也全免。中央大学虽另有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中文系,但它设在文学院内,不能享受免费待遇(实际上后来那时家在沦陷区的学生也都可以领取贷金,并不需要交钱),所以我报考了师范学院的国文系。这个系因为是新创办的,第一年都是公共必修课,不但没有自己的教师,就连系主任也没有。第二年才请来了伍叔悦先生当系主任。伍先生是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思想较开明,颇能继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思想作风。在他主持下,罗致了各方面的人才。先后来校任教的有罗根泽、孙世扬、顾颉刚、乔大壮、朱东润、曹禺、徐訏等先生,老舍也被请来作过讲演。此外还有杨晦、吴组缃、吴世昌等先生,不过他们到那时我已经毕业了。

我是1942年毕业的,毕业后教过一年中学。1943年就由伍叔悦先生介绍,去当时也内迁在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教国文。1946年交大迁回上海,我也随校到了上海。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即调来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一直到现在。先任讲师,1980年升教授。我在大学任教已经有45年了,其间没有担任过助教,也没有担任过副教授。当讲师的时间竟有37年之久(在交大的头两年名义是教员,待遇同讲师),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恐怕也是很少有的。

我在学生时代就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四年大学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在茶馆里度过的。一本书、一碗茶,就可以消磨半天。有时

也打桥牌、下象棋。跟我经常在一起的几个同学也是以自由散漫著称的。不过,他们除了下棋打牌以外,还喜欢演戏、赛球等活动。这些,我就只当捧场的看客,不亲身参加了。我们还用墙报形式办过一种名叫《文艺风景》的纯文艺刊物,曾经出过好几期。我只提供稿子,不管编排、张贴等事。后来还准备办一种已经定名为《海市》的墙报,取“海市蜃楼”之义,我已为它写好了发刊词,但最后这个刊物似乎并未办起来。伍叔傥先生教我们的功课中,有一门叫“各体文习作”,经常要我们练习写作。当时在中央大学,“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是不读的。写作,在文学院的中文系也都是用文言。伍先生却文白不拘,都可以。他出的作文题也十分灵活,很便于写志抒情;有时也可以由学生自己命题。所以同学们都不以作文为苦,而且很愿意听他看过我们的习作以后的评讲。我一向懒散,只爱看书而不喜动笔,自己主动写文章的时候很少。伍先生的“各体文习作”一连开了几年,至少每两周要作文一篇。我在学生时代,也就是在他的督促下,才写了一些文章。当年办《文艺风景》时,我所提供的稿件,就都是来自这些习作。它们虽大都是命题作文的产物,但由于我上面所说的原因,却很可以显出自己的真性情,我自己很喜欢。何况上面还有伍先生写的评语,特别值得珍惜。因此,时间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并屡经播迁,“文化大革命”中还多次被抄家,这些文稿却绝大部分仍被保存下来了。如今,虽已纸质发黄,有的还被虫啮鼠咬,但有时偶然翻到,仍不免怦然心动。即使本来在忙着别的事,一拿到手,就会立即悄然凝神,展卷重读。于是数十年前旧事,恍然如在目前。一时思绪万千,此中情味,实在难以言宣。我自己虽然很喜欢这些文章,当时却很少想到要向报刊投稿。除了因偶然的机缘发表过极少的几篇外,其余都没有发表过。解放以后则因为文中的思想感情与时代气氛不合,就更想不到要发表它们了。也许它们是愿意永远陪伴我,并随我一同长眠于地下的吧!

喜欢看书而不喜欢写文章,这恐怕是很多人都相同的。但在我,这种不喜欢写文章,甚至怕写文章的心理,已经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习惯,我对这个习惯的忠诚,真可以说是数十年如一日。要没有强大的外力的推动,我这个习惯是很难破除的。1957年《论“文学是人学”》的写作是这个习惯被外力冲破的一个例子,后来所写的其他文章,可以说也都是在外界的催逼下写出来的。

我想,我之所以被人知道,无非是因为我写了《论“文学是人学”》并受到了批判。大家比较感兴趣并愿有所了解的,恐怕也是与《论“文学是人学”》有关的事。虽然我已先后两次在别的文章中谈过这

方面的情况,这里不妨再讲一讲。

这已经是30年以前的事了。1957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许多兄弟院校都推派了代表来参加。校、系各级领导在此之前早就为召开这次会议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并多次郑重地向教师们发出号召,要他们提交论文。我在各方面的一再动员和敦促下,遂勉力于那年的2月初写成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在那时刚宣布不久的“双百方针”的精神的鼓舞下,如果没有当时那种活泼的学术空气的推动,单凭一般的号召和动员,我也不一定会写。即使写,文章的面貌,恐怕也将大大地不同了。后来,许多批判我的人都在这个写作的时机问题上大做文章,尽管他们不免有用政治批判来代替学术争论的偏向,却也不是全无道理的。何况,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们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学校举行的那次讨论会上,许多与会者都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几乎没有人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只有一个毕业班的学生(他就是陈伯海同志)最后站出来为我辩护了几句。在学术问题上,总免不了会有不同的意见。受批评,遭反对,也是常有的事。但看到自己的观点竟如此地得不到支持,却也不免有点懊丧。

讨论会后不久,《文艺月报》(即《上海文学》的前身)的一位编辑,由校内一同事陪同来访,我不知道他访问的目的是否与这篇文章有关。在谈话中,我这位同事向他提起我有这样一篇论文。我随即告诉他们我这篇论文已在讨论会上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也许是出于通常的礼貌关系吧,他要我把文章给他看看,我就给了他一份打印稿。没过几天,这个杂志的另一位编辑跑来找我,说那篇文章他们编辑部理论组的同志看过了,并且经过讨论,认为它“既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修正主义的”,(这是他的原话。我不知道这话究竟是否真是编辑部的意见,或者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随口而出的说法?)编辑部准备发表,要我再仔细校阅一遍后尽快给他们寄去。我也就依言照办了。本来,一个稍有自知之明的人,或者一个处世比较谨慎的人,在讨论会上听了那么多批评意见以后,是不会轻率地同意把文章公开发表的。个别同志知道《文艺月报》将要发表这篇文章后,就警告我说:“别是钓鱼呵!”但我既缺少自知之明,又一向不甚懂得处世要谨慎的道理。何况,我还满以为自己的意见并不错,正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评断。能够公开发表,当然是很欢迎的。至于“钓鱼”之说,我决不相信学术界会有这等事,因此,甚至对这样说的人很有些反感。

后来,《文艺月报》正式刊出了这篇文章,出版日期是1957年的5月5日。就在这同一天,《文汇报》在《学术动态》栏里特地发了一则消息介绍了这篇文章,并冠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的标题。校内同事见了,有的为我高兴,有的则认为这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号召大家起来批判。实际上,5月5日这一天,《文艺月报》还没有送到读者手中,书店里也并无出售,《文汇报》这则消息的来源以及作此报道的背景究竟如何,是难免要引起人们的猜测的。但我自己对此也一无所知。因此,对周围的人的种种不同反应,只能一概抱着将信将疑,姑妄听之的态度。我也知道,文章发表后免不了会受到很多的批评和指责的,但根据“双百方针”,我也完全可以进一步申述观点,为自己辩护,并提出反批评。真理总是愈辩愈明,最后服从真理就是了。本着这样的认识,所以我对《文汇报》的报道中不符我原意的地方(如说我“否定了文学反映现实的理论”)也不想急于更正,认为尽可留到以后的答辩文章中再加以说明。谁知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偏向愈演愈烈,对我的批判也逐渐从学术转向政治,我已没有机会进行申辩了。

对于《文艺月报》竟会发表我这篇文章,当时也有种种传说。有的说发表的目的就是为了批判;有的说是因为想展开一些讨论。在此文受到公开批判以后,一位同事告诉我,他参加了一个会议,姚文元在这个会上公开说是他竭力主张发表这篇文章的。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篇典型的修正主义文章,公开发表出来,就是为了便于让大家来批判。这一说法,在“四人帮”粉碎以前一直是广泛流传,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但“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却又听到了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姚文元当时是真心赞成发表这篇文章的,但后来政治形势变了,他就又转过来,以批判我的急先锋的姿态出现了。我不知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可靠。尽管前一种说法是当时就有的,而且是有人亲自听到姚文元本人在一个会上公开讲的,似乎不容怀疑。但后一种说法,却也并非全然不可信。因为不但持这种说法的人是当时《文艺月报》理论组的一个成员,而且像姚文元那样的人,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类的事情,真是司空见惯,毫不足怪的。就像《文汇报》那则消息,当初有些人就认定那是为了要对我进行批判而预先发出的信号。等到《文汇报》被指责是代表资产阶级方向以后,这些人又把这则消息说成是对我的吹捧,并以此作为我的文章思想反动的一个证据了。

大约是在那年的八九月间,即文章发表的三四个月之后吧,上海